

国家审计“以人民为中心”的理论渊源、实践样态及国际价值

张 睿¹, 田高良², 马 晨¹, 田梓辰³

(1. 西北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 陕西 西安 710127; 2. 西安交通大学 管理学院, 陕西 西安 710049;

3. 新加坡管理大学 会计学院, 新加坡 178900)

[摘 要]“以人民为中心”是中国国家审计的核心理念。在构建中国审计学自主知识体系的语境下,探讨“以人民为中心”从何而来、如何运行、何以可借鉴。研究指出,“以人民为中心”理论渊源于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中的人民主权与公共监督思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审计人民性的理论演进以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以民为本”思想的现代转化;其实践样态包含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与统筹协调(机制基础)、研究型审计与信息化建设(技术支撑)、事关人民利益的审计重心(工作导向)以及审计整改闭环与协同监督体系(协同保障);其国际价值体现在为国际审计研究提供不同于西方主流理论的分析维度、框架和视角,为他国审计发展和全球公共治理提供可转化经验。

[关键词]国家审计;以人民为中心;中国审计学自主知识体系;国际价值;国家治理;研究型审计

[中图分类号]F239.4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4-4833(2026)05-0023-10

一、引言

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届中央审计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强调要“坚持围绕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开展审计”、审计工作要“聚焦推动兜牢民生底线”^[1]。在构建中国审计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学术语境下,“以人民为中心”已成为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审计的一个关键标识,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构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审计的根本立场^[2]。在处于中国审计学自主知识体系核心地位的国家审计领域^[3],“以人民为中心”开展审计的理论基础何在?其如何从理念转化为制度安排与实践机制?其对全球审计发展具有何种参考价值?系统回答这些问题,对于深化中国特色国家审计研究、构建中国审计学自主知识体系、提升我国在国际审计领域的话语权与影响力具有重要意义。

梳理以往研究国家审计“以人民为中心”的相关文献,在理论层面,许莉提出国家审计“受人民之托”的本质属性^[4]。蔡春等以公共受托经济责任为原点,构建了圈层结构式国家审计理论框架^[5]。蒋彭阳等将国家审计置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语境中,强调其人民属性与其他属性的统一^[6]。刘明辉等提出“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是新时代中国特色国家审计文化的时代标识之一^[7]。周立云等指出中国现代审计伦理建构的治理逻辑之一即为“人民至上”的价值导向^[8]。陈汉文等系统论证了审计工作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立场^[2]。在实践层面,学者们深入探讨了乡村振兴审计^[9]、社会保障审计^[10]等民生审计具体领域的工作开展。在国际比较层面,针对性研究较少,现有文献主要从不同制度背景出发,比较了中国与西方国家审计模式的差异^[11-15]。上述研究为本文奠定了基础,但在以下方面仍有拓展空间:一是虽有研究涉及国家审计的人民属性,但多将其作为多个属性之一进行简要论述,将“以人民为中心”作为核心线索展开系统性理论溯源的研究较少,特别是从马克思主义经典论述到其中国化演进同时结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贯通分析脉络尚不多见;二是关于“以人民为中心”的实践样态,现有研究多聚焦某一类具体审计业务(如社保审计、扶贫审计),较少尝试从机制-技术-导向-协同等维

[收稿日期]2026-02-04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项目(72202176);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后期资助项目(21FGLB006);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后期资助项目(24FGLB067);陕西省社科基金年度项目(2024R299);陕西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2025QBR011)

[作者简介]张睿(1991—),女,河南三门峡人,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博士,从事审计、公司治理、资本市场等研究;田高良(1965—),男,陕西富平人,西安交通大学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博士,从事智能财务与管理会计、内部控制与风险管理、资本市场与公司治理等研究,通信作者,E-mail:tian-gl@xjtu.edu.cn;马晨(1983—),男,陕西西安人,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博士,从事审计与公司治理等研究;田梓辰(1998—),男,陕西西安人,新加坡管理大学会计学院博士研究生,从事审计、企业文化等研究。

度进行结构化分析,难以充分体现“以人民为中心”如何作为价值主线贯穿于国家审计实践之中;三是在国际视域下,现有研究多停留在在中西方制度差异的描述性比较,对于中国“以人民为中心”的审计理念与经验能够为国际审计学术研究、其他国家审计建设以及全球公共治理合作提供何种理论补充与实践启发,尚少见深入讨论。

鉴于此,本文聚焦国家审计“以人民为中心”这一核心理念,采用规范分析、比较分析等方法,围绕其理论渊源、实践样态以及国际价值展开研究。本研究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第一,本文以“以人民为中心”为分析主线,从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中的人民主权与公共监督思想出发,经由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审计人民性的理论演进,结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以民为本”思想的现代转化,系统追溯了国家审计“以人民为中心”的理论渊源,揭示其从哲学命题演化为审计理念的理论逻辑,弥补了现有研究在理论溯源上的不足。第二,本文将“以人民为中心”作为统合线索,遵循“机制基础—技术支撑—工作导向—协同保障”的逻辑,对相关审计实践(如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与统筹协调、研究型审计与信息化建设、事关人民利益的审计重点、审计整改闭环与协同监督体系)开展结构化分析,重新阐释了这些实践样态的内在关联——机制基础回答“由谁领导统筹以确保为人民审计”,技术支撑回应“如何精准识别影响人民利益的问题”,工作导向明确“为人民审计的重点在哪些方面”,协同保障解决“如何将审计成果转化为人民可感知的治理改善”,超越了以往将“以人民为中心”开展审计等同于民生审计的狭隘理解。第三,本文提出国家审计“以人民为中心”的国际价值,从提供公共利益导向的补充性分析维度、多元化的审计独立性制度分析框架和治理促进的功能定位讨论视角三个方面,阐明其对国际审计研究的理论价值,从在国际审计交流合作中传播与体现、为面临相似挑战的国家提供参考和借鉴两个方面,阐明其对其他国家审计发展与全球公共治理的实践价值,并明确其经验转化与价值实现的条件和路径,深化国家审计国际比较研究。

二、国家审计“以人民为中心”的理论渊源

国家审计“以人民为中心”的理论渊源涉及这一核心理念从何而来、因何形成、如何演进等基本问题。本文认为,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中的人民主权与公共监督思想为其提供了哲学基础;同时,该理论渊源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经历了从革命时期到新时代的理论演进;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以民为本”的价值取向则为其提供了文化资源。这些层面依次回答了理论根基、演进脉络和文化支撑的问题。

(一)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中的人民主权与公共监督思想

国家审计“以人民为中心”的理论根基可以追溯至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人民与公共权力监督的基本论述。在概括论述巴黎公社经验时,马克思指出,公社实现了“由人民自己当自己的家”,一切公职人员由“公社随时可以罢免的勤务员来代替”^[16]。此类论述初步确立了与审计人民性相关的理论要点:公共权力来源于人民并服务于人民,公共资源的使用必须接受人民的监督;监督机制的设计应当确保公职人员对人民负责,审计正是实现这种监督的重要制度安排。恩格斯在总结公社经验时进一步指出,“国家最多也不过是无产阶级在争取阶级统治的斗争胜利以后所继承下来的一个祸害”,所以必须“尽量除去这个祸害的最坏方面”^[16],其中就包括建立有效的监督制约机制。列宁继承并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的监督思想,他提出对社会主义来说,“任何人都不能成为‘官僚’”,应“立刻转到使所有的人都来执行监督和监察的职能”^[17]。在社会主义国家建设实践中,列宁高度重视监督的制度化建设,主张建立工农检察院和监察委员会,使普通工农群众能够参与国家管理和监督活动。列宁将监督定位为保障人民利益的制度工具,强调监督是人民评判公共权力运行效果的重要途径,这一定位从理论上启发了后来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和建设中的审计监督制度发展。

本文认为可以从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中提取出几个关于审计人民性的核心命题:一是审计权的正当性来源于人民主权,国家审计代表人民对公共资源的使用进行监督;二是审计的根本目的是维护人民利益,保障公共权力正当运行;三是审计制度的设计应当服务于人民对国家事务的知情权和监督权。这些命题既构成了审计人民性的理论基石,也为理解中国国家审计“以人民为中心”理念的深层逻辑提供了学理依据。

(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审计人民性的理论演进

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中的人民主权与公共监督思想在中国共产党领导审计工作的百年历程中经历了从革命时期的实践自觉到新时代的系统阐发这一理论演进过程。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各革命根据地建立审计机构,其基本职能就是监督经费的使用是否服务于人民战争和革命事业。从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安

源路矿工人大罢工中成立的经济审查委员会,到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为保持优良传统、防止腐化浪费而进行的审计制度建设,再到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重在“供给战争,发展经济”的审计监督目标^[18],早期的审计工作者在革命实践中逐渐形成甘为公仆、廉洁奉公、艰苦朴素、勤俭节约、接受群众审查监督等工作作风,这也奠定了中国国家审计的红色基因^[7,19]。革命时期的审计实践虽然在技术上较为简朴,但已确立了审计服务人民利益的基本立场,将马克思主义关于人民监督的理论命题转化为具体的工作安排。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特别是1983年审计署成立以来,国家审计制度逐步建立健全。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及其实施条例、《中央预算执行情况审计监督暂行办法》《国家审计准则》等一系列规范性文件的颁布实施与补充修订,审计监督的法律地位得到确立和巩固,审计的范围也从财务收支审计逐步扩展至预算执行审计、经济责任审计等领域^[20]。在此过程中,审计人民性的主要体现途径是审计结果向人大和政府报告并向社会公开,保障人民群众的知情权。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人民为中心”的审计理念得到系统性深化和创新性发展。一方面,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审计工作的系列重要论述将“以人民为中心”提升到新的理论高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其核心要义之一就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代表性思想观点包括“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民之所忧,我必念之;民之所盼,我必行之”“人民至上”等^[2,21]。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细化、深入到经济社会发展的各领域各方面。在审计监督领域,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构建集中统一、全面覆盖、权威高效的审计监督体系”的总体要求,将审计工作上升为党和国家事业全局的重要组成部分。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审计工作要“聚焦推动兜牢民生底线”,将维护人民利益确立为审计工作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强调打造“值得党和人民信赖”的“‘国家审计’金字招牌”,习近平总书记从“审计方向更加明确”和“思路举措更加有效”两个方面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审计事业发展规律进行科学诠释,强调“坚持围绕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开展审计”,使之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审计规律性认识的核心内容^[1]。另一方面,“以人民为中心”的理论内涵进一步丰富。从以上重要论述的内在逻辑看,这一时期国家审计“以人民为中心”已形成一个较为系统的理论结构:其一,国家审计的权力来源于人民,受人民所托、由人民赋予,审计必须始终坚持对人民负责,成为担得起人民信任与重托的监督“利器”;其二,国家审计的根本目的是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22];其三,国家审计的监督对象从传统的财政财务收支扩展到公共资金、国有资产、国有资源、领导干部经济责任等,全面覆盖属于全体人民的公共财产和人民委托管理的公共事务;其四,国家审计的功能定位是在经济监督的基础上提升治理效能,审计在发挥经济监督基本职能的同时,还被赋予推动政策落实、促进深化改革、维护经济安全等多重治理功能^[23],从单纯的查账工具拓展为多层次的治理服务,包括但不限于发现损害人民利益的违法违规行为,评价公共政策是否有效惠及人民群众(绩效评价),揭示危及人民利益的制度漏洞和风险隐患(风险预警),推动制度完善以从根本上保障人民利益(制度建设)。

综合来看,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审计人民性的理论演进呈现出从朴素实践自觉到系统理论建构、单一财务监督到综合治理促进、内部制度安排到公共治理体系重要组成的发展轨迹。

(三)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以民为本”思想的现代转化

国家审计“以人民为中心”的理论渊源除了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的传承外,还包含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以民为本”思想的深厚积淀与转化。中国古代虽无现代意义上“以人民为中心”的概念,但在长期的国家治理实践中形成了“以民为本”的治理理念和审计监察传统,为现代审计“以人民为中心”提供了扎实的文化支撑。

中国传统治国理政思想中蕴含着丰富的民本观念。例如,《尚书·五子之歌》所载“民惟邦本,本固邦宁”,认为人民是国家的根基;《孟子·尽心下》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明确了民众利益在政治秩序中的优先地位;《管子·牧民》指出“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将民心向背视为治理成败的根本标准。这些思想虽然在历史语境中受到封建君主制框架制约,但其中关于治理应以民众福祉为归依的价值取向具有跨越时代的延续意义,构成了现代审计“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根基^[8]。

在具体的审计监察制度实践中,传统文化的民本取向也有所体现。例如,周代所设宰夫一职,其职责重在审核官府财物出纳是否合规,客观上有助于减少贪腐对民力的侵蚀;秦汉时期的御史监察制度,在巡查地方吏治时将田租赋税、赈灾救济等纳入监察范围,一定程度上反映出监督活动对民生问题的关切;唐代的“巡察六条”将“农桑不勤,仓库减耗”“户口流散,籍帐隐没,赋役不均”“黠吏豪宗兼并纵暴,贫弱冤苦不能自申者”等直接涉及民众利益

的事项列为监察重点,“官人善恶”的监察标准中包含对官员施政是否惠及百姓的考量^[24];宋代设置审计院,在审核财政收支的过程中关注冗费、虚耗等损害国用和民利的问题;明清时期将不得科派加征、不得侵吞挪用等涉及百姓负担的事项纳入对钱粮收支的审核要求。尽管上述制度在根本目的上以维护封建王朝秩序为主,但制度中蕴含的取之于民、用之于民、体恤民生的治理关切与监督思想成为后来国家审计“以人民为中心”的历史借鉴。

需要说明的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以民为本”与现代国家审计的“以人民为中心”存在本质区别。前者建立在封建君主制国家的治理框架之下,爱民、恤民的出发点是维护统治秩序的稳定;后者建立在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制度之上,人民是国家权力的最终拥有者而非恩赐对象。因此,传统文化对于现代审计主要是贡献了可继承的文化资源,这些文化资源经过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改造和社会主义制度的重塑,才转化为现代审计“以人民为中心”的有机组成部分。其转化具体表现为从为君主监督臣僚转变为人民监督权力,审计监督的权力来源从君权转变为人民主权;从维护赋税秩序转变为保障公共利益,审计的功能定位从财政控制扩展为公共治理;从以吏治考核为中心转变为以民生治理为导向,审计评价的主要标准从行政效率转变为人民获得感。

上述三个层面——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中的人民主权与公共监督思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审计人民性的理论演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以民为本”思想的现代转化,共同构成了国家审计“以人民为中心”的理论渊源。接下来,本文将探讨“以人民为中心”的理论命题如何通过具体的制度设计转化为可操作的组织安排和工作机制,进而在实践中形成可观察的运行形态。

三、国家审计“以人民为中心”的实践样态

“以人民为中心”理念在实践中的展开主要遵循四重逻辑:一是通过审计领导体制设计落实为组织保障,明晰由谁统筹审计资源、确保审计方向指向人民利益,这构成实践展开的机制基础;二是利用审计方法论和技术手段的创新落实为监督能力,精准识别影响人民利益的深层次问题,这构成实践展开的技术支撑;三是借助向关键领域倾斜落实为审计重点,厘清审计应当特别关注哪些与人民利益直接相关的方面,这构成实践展开的工作导向;四是依托审计整改和协同监督落实为治理实效,明确审计成果如何转化为人民可感知的治理改善,这构成实践展开的协同保障。本部分沿着“机制基础—技术支撑—工作导向—协同保障”的逻辑,从四个维度系统分析“以人民为中心”在审计实践中的具体样态。

(一) 机制基础: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与统筹协调

审计为人民服务的前提是审计资源能够被有效组织,并配置于人民最需要的领域。如前文理论渊源所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演进要求审计工作服务于人民利益,在实践中,这一要求首先通过党对审计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及其所形成的统筹协调机制来落实,其标志性举措即成立中央审计委员会。作为党中央决策议事协调机构,中央审计委员会“权威性最高、职责范围最广、承担任务最重”,其设立“是国家审计模式的一项创举”^[3],将党对审计工作的领导从宏观指导转向系统化的制度安排。相关安排加强了党的集中统一领导,能够有效整合审计监督力量,使审计在服务国家治理和维护人民利益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25]。

具体来讲,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与统筹协调机制在保障审计“以人民为中心”方面的作用首先是对审计方向的把控。在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下,审计工作计划围绕党和国家的中心工作作出部署,确保审计力量优先投向涉及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领域。例如,审计署统一组织全国审计机关深度参与脱贫攻坚,对扶贫资金和政策落实情况全覆盖审计^[9];又如,中央审计委员会统筹部署全国性的政府债务专项审计,由中央统一定调、地方分级落实,以助力打赢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攻坚战,推动隐性债务有序化解,防止民生支出被侵蚀。这些审计项目的选择和实施,所指向的正是人民利益可能受到损害的重点领域。同时,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与统筹协调机制的作用还体现为审计力量的整合调配。在统筹协调机制下,审计机关能够跨区域、跨层级、跨部门调配审计资源,有效破除地方保护和部门壁垒的制约。如陕西省深入推进审计“两统筹”工作,统筹审计项目、审计组织方式,横向整合审计机关多业务部门,精心组织实施统筹项目,强化审计信息和成果共享,力求“一审多项”“一审多果”“一果多用”^①。宁夏回族自治区也将党政领导干部经济责任审计与政策跟踪审计、预算执行审计、政府债务审

^①资料来自 <https://www.audit.gov.cn/n4/n20/n524/c138015/content.html>。

计、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等多类审计项目进行“1+N”式统筹结合^①。山东省多地的审计机关也通过统筹协作,提升了审计效能^②。此类统筹实践将分散的审计力量聚合为整体性的监督能力^[26],使审计监督能够立体覆盖到人民利益可能受到损害的多个维度。除此之外,这一机制的作用还反映在审计独立性的制度保障上。与西方国家审计通过与行政系统的分离实现独立性不同,中国国家审计的独立性主要借由党的集中统一领导所提供的政治权威和制度保障来实现。作为党中央决策议事协调机构,中央审计委员会可以有效排除行政干预对审计工作的影响,确保审计人员在面对强势被审计单位时,仍然能坚持原则、依法审计。这一独立性保障机制根本上是为了确保审计真实反映问题、切实维护人民利益。

(二) 技术支撑:研究型审计与信息化建设

机制基础解决了“由谁领导统筹以确保为人民审计”,接下来,技术支撑则回应审计“如何精准识别影响人民利益的问题”。如前所述,“以人民为中心”的审计理念需要通过审计方法论和技术手段的创新落实为监督能力,而研究型审计正是审计方法论创新的核心所在。研究型审计强调将研究思维贯穿审计立项、实施、报告和整改全过程,推动审计从合规验证转向问题研判与制度分析^[27-29],其“全面贯彻并系统运用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核心要义与实践要求”^[21],是中国国家审计在方法层面的原创性探索。研究型审计对于审计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重要价值在于使审计超越表面的数据核查,深入分析政策执行偏差的制度原因、资金使用低效的结构性因素以及风险传导的深层机理等,为促进问题根本解决和人民福祉改善提出更有针对性的审计建议。以民生领域的审计为例,传统的合规性审计主要关注民生资金的使用是否符合预算和财务制度,但对政策目标是否实现、资金使用是否产生了预期的社会效益等问题,其分析的深度较为有限。相比之下,研究型审计通过引入政策分析、制度比较、因果推理等研究方法,沿着民生政策执行的逻辑线路,系统评估政策执行与落实效果,识别其中的难点堵点,并进一步分析背后的体制机制问题。在社保审计实践中,文华宜研究指出,审计工作的人民性要求审计人员除了查出社保资金管理使用中的违规问题,还要借助研究型审计的方法,分析社保制度运行中的结构性缺陷,促进制度修复和治理完善^[10]。

另外,信息化建设也为审计能力的提高提供了技术支持。郭檬楠等、李璐璐和上官泽明的研究表明,国家审计信息化建设显著提升了审计监督的治理效能^[30-31]。在“以人民为中心”的审计实践中,信息化建设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例如,借助大数据分析工具,审计机关可以进行海量财政、税务、社保、金融等数据的跨部门、跨系统关联比对,快速识别异常资金流向和潜在风险点;审计机关还能够利用地理信息系统等技术,对扶贫项目、生态环境保护等涉及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领域开展可视化分析与远程监测。先进的技术手段推动传统的抽样检查逐步迈向总体分析,强化了监督的穿透力和发现力,促使审计在更大范围内更加及时、精准地定位侵害人民利益的违规行为和制度漏洞。

在具体工作中,研究型审计与信息化建设紧密结合的审计思路已逐渐形成^③。此类工作思路依托审计技术方法的升级,支撑审计监督不断拓展广度及深度,持续增强为人民服务的能力。由此,“以人民为中心”理念的落地需要将技术方法有效融入审计监督全过程,以助力审计实现维护人民利益的根本目标,这是比技术方法本身更为关键的实践要求。

(三) 工作导向:事关人民利益的审计重心

“以人民为中心”要求审计机关“当好人民权益的维护者”^[2],在审计实践中,该理念还具象化为明确的工作导向,回答“为人民审计的重点在哪些方面”。

一方面是民生资金和民生项目审计的深化。近年来,审计机关持续加强扶贫、社保、教育、医疗、住房等民生领域的审计监督。尤其是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过程中,国家审计开展的审计活动如监督惠农资金的规范使用、揭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中的质量和效益问题等^[9]^④,直接关系广大农村居民生产生活条件的改善和收入水平的提升,是“以人民为中心”在具体审计领域中的直观呈现。在社保审计中,审计机关始终将“看好和推动用好民

①资料来自 https://sjt.nx.gov.cn/sjzx/jgdt/202208/t20220805_3659941.html。

②资料来自 http://audit.shandong.gov.cn/art/2025/5/9/art_200753_9883.html。

③资料来自 <https://fgw.henan.gov.cn/2024/04-08/2975126.html>。

④资料来自 <https://www.audit.gov.cn/n4/n21/c10761749/content.html>。

生资金作为审计最大的为民情怀”^①,借助实施资金核查、制度评价、风险揭示等技术性工作,推动社保制度的公平运行以及社保基金的安全管理^[10],由此保障人民群众的基本生活权益。另一方面是资源环境审计的拓展。“良好的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32],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和生态环境审计的开展体现了审计“以人民为中心”在生态文明建设领域的延伸。审计机关通过监督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管理责任和生态环境保护责任,关注损害人民利益的重大生态环境事件,推动环境问题解决,促进环境质量改善,维护人民群众享有良好生态环境的权益^[33]。除此之外,公共政策审计也日趋常态化。审计机关对重大政策措施落实情况开展跟踪审计,持续关注稳就业、稳投资、减税降费、优化营商环境等政策能否产生惠及民众的实际成效。这类审计的常态化将审计监督从事后的资金检查前移至政策执行过程,使之能够及时发现政策执行偏差并推动纠正,减少政策目标与实际效果之间的落差。站在“以人民为中心”的角度看,政策落实跟踪审计的核心关切是党和国家出台的各项惠民政策是否真正落到了人民群众身上。

随着国家审计向与人民利益息息相关的关键领域倾斜,“以人民为中心”的核心理念落实为审计的工作导向与监督重点;审计对资金使用的评价标准不再仅限于合规性,也进一步囊括了绩效性和公平性;审计关注的对象除了被审计单位的财务行为,还延伸至政策执行对目标群体的实际影响。这种从合规导向向绩效与公平导向的拓展,明确了审计实践的着力方向,有助于将审计结果切实融入对人民利益的维护当中。

(四)协同保障:审计整改闭环与协同监督体系

如果说机制基础解决国家审计“由谁领导统筹以确保为人民审计”,技术支撑回应审计“如何精准识别影响人民利益的问题”,工作导向回答“为人民审计的重点在哪些方面”,那么协同保障解决的则是“如何将审计成果转化为人民可感知的治理改善”。如转化逻辑所叙,审计维护人民利益的目标需要通过审计整改和协同监督落实为治理实效。在中国国家审计实践中,审计整改闭环和协同监督体系共同构成了保障审计成果落地的制度安排。

审计整改闭环是审计实现“以人民为中心”的“最后一公里”。作为国家审计的“下半篇文章”,审计整改闭环推动审计监督实现从发现问题到解决问题的本质跃迁,是新时代中国特色国家审计发挥“治已病、防未病”作用的关键载体^[34]。回顾党领导的审计整改制度的发展历程,审计整改从单一问题纠正逐步演进为系统制度修复^[35]。就“以人民为中心”而言,国家审计形成的“揭示问题—整改落实—完善制度—提升治理”贯通一体的审计整改闭环实践,核心功能是确保审计揭示的损害人民利益的问题、提出的促进治理改善的建议分别能够得到切实的纠正和认真的落实。审计整改具体环节主要包括:审计发现问题后向被审计单位提出整改要求,明确整改内容、期限及责任主体;被审计单位制定整改方案并组织实施;审计机关对整改情况进行跟踪检查,评估整改效果;向社会公开审计整改结果,接受人民群众的监督。这些环节紧密衔接、构成闭环,有助于审计监督实现长效化,产生持续性的治理效果。

协同监督体系进一步增强了审计成果的运用效力。审计监督作为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与纪检监察、人大监督、司法监督、财政监督、金融监督等形成贯通协同的联动关系。尤其在反腐败领域,国家审计与纪检监察协同治理的效应明显,两者在信息共享、线索移送、联合督办等方面的贯通能够显著提升监督效能^[36-37]。在“以人民为中心”的框架下,协同监督的价值主要体现在对审计发现的严重损害人民利益的违法违纪问题,审计机关可以依法移送纪检监察机关、司法机关或相关部门处理,确保问题得到严肃追究;对于审计揭示的制度性、体制性缺陷,审计机关可通过向人大报告、向党委和政府建议等途径,推动政策层面的改革完善。

审计整改闭环与协同监督体系的结合,使国家审计在维护人民利益方面形成了从发现问题到评价结果再到采取措施解决问题的完整链条,区别于一些西方国家审计机关仅具有建议权而缺乏推动整改的制度化渠道的状况,这一结合增强了审计监督的实效性,是中国国家审计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重要保障。

综上,“以人民为中心”的国家审计,围绕“机制基础—技术支撑—工作导向—协同保障”形成了一系列实践样态。前文梳理的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中的人民主权与公共监督思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审计人民性的理论演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以民为本”思想的现代转化等理论渊源,共同凝结成“以人民为中心”的核心理念;这一理念在审计实践中通过制度设计转化为组织安排和工作机制,落实为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与统筹协调、研究型审计与信息化建设、事关人民利益的审计重点、审计整改闭环与协同监督体系等运行形态,这既是对“以人民

^①资料来自 <https://www.audit.gov.cn/n4/n19/c10244964/content.html>。

为中心”理论命题的现实运用和具体呈现,反过来又能促进相关理论与研究的持续丰富和完善。

四、国家审计“以人民为中心”的国际价值

在系统梳理国家审计“以人民为中心”的理论渊源与实践样态的基础上,本文进一步探讨一个更具开放性的问题:作为积极参与全球治理的国家之一,中国国家审计“以人民为中心”的理论与实践能够为国际审计发展提供何种价值?此处所言“国际价值”,是指中国经验为国际审计议题讨论、其他国家审计制度完善以及全球公共治理合作所提供的理论参照和实践启发。由于各国的制度结构、权力配置、法治基础、治理目标等均存在差异,中国经验的国际价值主要表现为可借鉴性和可转化性(而非可复制性),其适用边界需结合具体制度背景加以判断。

(一) 理论层面的国际价值

在国际审计学界的研究中,审计独立性长期居于核心讨论位置。最高审计机关国际组织(INTOSAI)的《利马宣言》和《墨西哥宣言》均将独立性作为最高审计机关有效运作的首要原则。在这一理论范式下,审计的有效性主要通过其与被审计对象之间的组织距离和决策自主性来衡量。相关研究在梳理公共部门审计师独立性的影响因素时,归纳出组织独立、人事独立、财务独立、报告独立等维度^[15],这些维度构成了西方审计研究评价审计制度优劣的主要标尺。在此背景下,中国国家审计“以人民为中心”的理论与实践对国际审计研究具有以下补充意义。

第一,为国际审计研究提供了一个补充性的分析维度——审计的公共利益导向。在以独立性为中心的理论范式中,审计“为谁服务”的问题通常被简化为审计机关向立法机关报告的制度安排;审计与公共利益之间的关系被嵌套在“选民-议会-审计机关”的委托代理链条中间接处理。中国经验表明,审计的公共利益导向可以通过更加直接、明确的制度安排来实现^[22]。在中国的制度框架下,“以人民为中心”作为审计工作的根本立场,直接规定了审计目标的设定、审计重点的选择和审计结果的运用等均应应以人民利益为根本标准。这一做法虽然根植于中国特定的政治制度,但其中关于审计最终应服务于公众福祉的核心命题对任何政治体制下的审计制度设计都具有参考意义。

第二,为讨论审计独立性提供多元化的制度分析框架。国际审计学界围绕审计独立性展开的讨论大多强调最高审计机关与被审计对象保持适当距离,并依托任命机制、预算安排、任期保障等维护独立性^[13,15]。也有研究认为,在缺乏政治竞争的体制中,公共部门审计往往更接近内部控制工具,其问责功能主要通过提升行政管理责任间接实现^[14]。这些研究揭示了一个重要问题:审计独立性的实现形式受到各国制度环境的深刻影响,不存在唯一的最优模式。中国经验表明,在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下,审计独立性可以借助不同于西方主要依靠与被审计对象外在分离的制度路径来保障^[38-39],中央审计委员会的政治权威和制度安排能够有效排除行政干预,而党的根本宗旨又确保了审计的公共利益导向,结合统筹协调、法定职责、结果整改、监督贯通等机制,共同保障国家审计切实履行“受人民之托”的受托责任,推动公共权力更好地服务于人民利益和国家治理目标^[21,40-41]。此类独特的制度安排扩充了国际上关于审计独立性讨论的关注点,相关经验对于制度环境与西方国家存在差异的发展中国家,尤其是在探索适合本国国情的审计独立性保障机制方面具有理论参照意义。

第三,为审计功能定位的国际讨论提供治理促进视角。西方主流审计理论中,审计功能主要定位在鉴证与问责维度,对于绩效审计、合规审计等的争议,往往聚焦审计应否进一步介入政策评估和治理优化^[42]。中国国家审计在“以人民为中心”理念下形成的立足经济监督、服务国家治理的功能定位^[23,43],实际上提出了审计的另一重功能——通过监督促进治理改善,使审计成为连接信息、政策与治理结果的重要枢纽。这一功能定位为国际学界提供了有别于单纯问责导向的解释框架,表明审计的价值可以超越事后检查和报告,延伸至推动被审计单位改进管理、促进公共政策优化以及完善国家治理等能够对维护公共利益产生实效的层面,对国际上关于审计功能边界的讨论具有启发性。

上述补充意义并不意味着中国国家审计要在这些方面替代西方主流审计理论,西方理论在审计技术方法、质量控制体系、职业伦理规范等方面的知识积累对中国审计理论研究同样具有参考价值。国际审计研究的发展需要多元视角的对话与互鉴,中国国家审计“以人民为中心”的理论贡献主要在于为这一对话提供了一个基于不同制度逻辑的分析参照,拓展了国际审计研究的讨论空间。

(二) 实践层面的国际价值

在实践层面,中国国家审计“以人民为中心”的国际价值,一方面是在国际审计交流与合作中的传播和体

现。中国审计机关积极参与国际审计组织活动和规则制定,推动将公共利益保障、可持续发展等议题纳入国际审计合作框架。具体表现包括:一是参与 INTOSAI 的审计任务与标准编制等活动,在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审计、资源环境审计、人道主义援助资金审计等领域贡献了中国经验。二是在金砖国家最高审计机关负责人会议、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最高审计机关负责人会议等国际平台上,分享中国在公共资金监督、公共卫生审计、公众参与审计工作等方面的做法,为成员国家审计能力建设、公众参与度提升等提供了可讨论、参考的样本。此外,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审计合作中,审计署坚持“民心相通”的根本目标,通过开展以民生资金为重点、项目为基点的民生审计,推动沿线各国预警防范公共风险、提高政府的公共服务水平、维护各国人民的根本利益^[44]。在上述各类国际活动中,中国审计机关对外交流合作时所传递和输出的主要内容,不仅包括审计技术方法的推介,还包含审计如何服务于公共利益、如何促进可持续发展以及如何保障弱势群体权益等价值取向,这些价值取向的根源正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审计理念与实践在国际层面的表达和延伸。

另一方面是对面临相似治理挑战国家的参考价值。具体表现包括:一是审计参与重大风险治理的实践思路。在公共债务管理与风险防控等领域,中国国家审计通过全覆盖审计、穿透式检查等方式深度介入风险治理的经验为其他国家处理类似问题提供了一种可讨论的思路,即国家审计可以从被动的事后检查转向主动的风险识别与过程治理参与,在维护公共利益、防止风险外溢方面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二是审计整改闭环的建设经验。中国在审计整改长效机制方面的探索包括整改责任落实、跟踪检查、结果公开、与其他监督力量的协同等,对存在审计建议落实困难的国家具有借鉴意义,主要体现在,若要使审计真正发挥维护公共利益的作用,仅有高质量的审计报告是不够的,还需建立确保审计建议得到执行的制度安排。三是审计技术方法的创新经验。研究型审计、大数据审计等技术方法在中国审计实践中的广泛应用,特别是在民生审计、环境审计等涉及人民利益关键领域的应用经验,对于正在推进审计数字化转型以更好地回应公众关切与诉求的国家具有技术层面的参考价值。四是审计参与减贫和可持续发展的实践经验。中国在脱贫攻坚审计和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等方面积累的经验,对正在落实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发展中国家明确审计重点、优化评价标准,发挥审计对消除贫困、增进福祉、社会平等、节能环保等的助力作用,具有实践启发意义。

需要注意的是,中国国家审计“以人民为中心”实践层面的国际价值应当经过制度转换与本土情况充分适配才具备实现的可能。本文强调经验的可转化性而非可复制性,是因为不同国家在审计机关设置、权力结构、财政体制、法治传统、监督体系等方面均存在显著差异,任何国家的审计经验几乎都不可能以直接移植的方式在另一个国家取得同样的效果。较为可行的转化路径包含以下几个环节:第一个环节是审计目标的价值对标。他国可以参考中国经验,审视本国审计制度在服务公共利益方面是否存在可改进的空间,例如审计目标的设定有没有充分考虑普通民众的利益诉求?审计的重点是否涵盖了影响民众切身利益的关键领域?审计结果能否以适当的方式向公众公开?对这些问题的回答,毋需照搬中国具体的制度安排,但可从“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中获得反思的视角。第二个环节是审计组织与协同机制的本土化设计。他国可根据本国监督体系的特点,探索审计机关与其他监督主体的协同方式。协同的具体形式无论是在中央审计委员会统筹下与纪检监察等监督部门的联动(如中国模式),还是同议会监督委员会的配合(如英美模式),抑或和民间专业机构的合作(如加纳等部分发展中国家)等,均需根据本国的制度框架来确定,从而形成能够促进公共受托责任履行的监督合力。第三个环节是审计技术方法的选择性借鉴。他国需要结合本国的数据治理条件、审计人员素质、信息基础设施等实际情况,考虑研究型审计、大数据审计等的方法借鉴。对于数据治理基础较好的国家,可以优先引入大数据审计技术;对于审计人员研究能力较强的国家,可以侧重借鉴研究型审计方法论;而对于基础条件尚不完备的国家,则可从在公众最关心、诉求最集中的领域试点探索开始,逐步积累经验。第四个环节是审计整改机制的渐进式构建。审计整改闭环的建立与运行需以一定的制度基础(如明确的整改责任归属、有效的跟踪检查手段、透明的结果公示渠道等)作为保障。他国在借鉴时,可以根据本国的法治环境和行政管理能力,渐进式地构建整改跟踪与结果运用机制,以稳步提升审计监督维护公共利益的力度和实效。

综合看来,中国国家审计“以人民为中心”理论与实践层面的国际价值,既非替代西方主流审计理论,也非无条件外推本国经验,而是展示了一种基于本国制度环境、将“公共利益保障”作为审计制度设计核心考量的治理思路,从而为世界范围内讨论与解决审计目标导向、监督效能提升、公共治理协同等问题提供一个包含中国经验、同时保持开放解释力的参照样本。

五、结论与展望

本文围绕国家审计“以人民为中心”，构建了“理论渊源—实践样态—国际价值”的分析框架，展开系统性研究；在中国审计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的语境下，本文探讨了国家审计“以人民为中心”核心理念“从何而来、如何运行、何以可借鉴”的问题，并得出以下研究结论：一方面，国家审计“以人民为中心”具有深厚的理论根基，包括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中的人民主权与公共监督思想（提供哲学基础和理论依据）、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审计人民性的理论演进（经历朴素自觉到系统阐发）以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以民为本”思想的现代转化（贡献可继承的文化资源）。另一方面，国家审计“以人民为中心”的理论命题，经由制度设计转化，形成“机制基础—技术支撑—工作导向—协同保障”的实践样态，其中，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与统筹协调是审计服务人民利益的组织前提；研究型审计与信息化建设为精准识别影响人民利益的深层次问题提供技术支持；民生审计、资源环境审计、公共政策审计等体现了审计向人民关心的重点领域倾斜的工作导向；审计整改闭环与协同监督体系则确保审计成果能够转化为人民可感知的治理改善。

进一步地，国家审计“以人民为中心”的理论与实践展现多层次的国际价值。在理论层面，其为国际审计研究补充了公共利益导向的分析维度、多元化的审计独立性制度分析框架以及治理促进的功能定位讨论视角，区别于西方主流审计理论，拓展了国际审计学界的研讨空间；在实践层面，其不仅在国际审计交流与合作中得到传播，提升了中国国家审计服务公共利益相关理念做法的国际影响力，还为其他国家的审计参与重大风险治理、审计整改机制建设、审计技术方法创新、审计参与减贫和可持续发展等提供了可借鉴的经验；他国对这些经验的借鉴转化，需要经过价值对标、本土化设计、选择性借鉴和渐进式构建等路径环节。

本文的理论意义：本文的分析一方面有助于厘清国家审计“以人民为中心”的理论渊源，深化对审计人民性的理论认识；另一方面，本文通过阐释“以人民为中心”的中国经验对国际审计研究的补充价值，说明审计的公共利益导向、审计独立性和审计功能的实现并不存在单一最优的制度路径，不同国家可在各自制度框架内探索形成相应的实现机制。本文的现实意义：本文从机制基础、技术支撑、工作导向、协同保障等层面，反映出“以人民为中心”的国家审计在维护人民群众根本利益中的现实作用。对于其他国家审计发展和全球公共治理而言，尤其是在保障公共利益方面，这些经验具有启发性、参考性与可转化性，其具体应用需结合本国的政治结构、法治基础、数据治理能力、监督体系配置等实际情况予以适配。

同时，本文也存在一定局限性。本文主要基于学术文献、官方资料等进行分析，未来可借助实地调研、数据库获取等途径，拓展跨国比较样本，引入量化指标，开展数据分析及大样本实证检验，强化结论的稳健性与普适性。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 在二十届中央审计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的讲话[J]. 求是, 2023(21): 4-10.
- [2] 陈汉文, 张笛, 韩洪灵.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审计的根本立场[J]. 财会月刊, 2025(3): 3-8.
- [3] 董必荣, 徐志耀, 陈汉文. 论构建中国审计学自主知识体系[J]. 审计与经济研究, 2025(1): 1-15.
- [4] 许莉. 国家审计本质认识论及其实践规律[J]. 审计与经济研究, 2021(5): 20-23.
- [5] 蔡春, 张筱, 郑伟宏, 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审计理论研究(第一卷)[M]. 上海: 立信会计出版社, 2022.
- [6] 蒋彭阳, 刘玉仙.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国家审计中的拓展与应用[J]. 社会科学家, 2020(7): 74-78.
- [7] 刘明辉, 刘雅芳, 滕立. 新时代新征程中国特色国家审计文化——深厚底蕴、时代标识与路径指向[J]. 会计研究, 2023(7): 3-17.
- [8] 周立云, 田瑶. 中国审计伦理的制度化建构: 传统文化基因与现代治理逻辑[J]. 审计与经济研究, 2025(6): 1-9.
- [9] “国家审计在乡村振兴战略中的作用研究”课题组, 赵保林. 乡村振兴审计的意义、重点和举措[J]. 审计研究, 2021(3): 3-10.
- [10] 文华宜. 坚持审计工作的人民性推动社保审计高质量发展[J]. 审计研究, 2024(6): 14-21.
- [11] 上官泽明, 吴秋生. 不同视野下国家审计治理能力评价与比较[J].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 2017(1): 76-82+159.
- [12] 董大胜. 从国际比较看中国审计的发展进步——写在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和实行审计监督制度36周年之际[J]. 审计研究, 2019(5): 3-5.
- [13] Xiao J Z, Yang S, Zhang X, et al. Institutional arrangements and government audit independence in China[J]. Abacus, 2016, 52(3): 532-567.
- [14] Mir M, Fan H, Maclean I. Public sector audit in the absence of political competition[J]. Managerial Auditing Journal, 2017, 32(9): 899-923.
- [15] Doan V A, Nguyen H X. Factors influencing the independence of public-sector auditor: A literature review[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uditing and Accounting Studies, 2023, 5(2): 165-181.
- [16] 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M].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编译.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5.
- [17] 列宁. 列宁全集(第三十一卷)[M].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编译.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85.

- [18] 张枫波.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审计监督目的:变迁与启示[J]. 南京审计大学学报,2025(1):21-31.
- [19] 朱灵通,胡志勇. 革命根据地审计精神文化的内容及其当代启示[J]. 江西财经大学学报,2019(4):107-117.
- [20] 姜江华,刘誉泽,杜相乾.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审计制度:发展历程与改革重点[J]. 中国行政管理,2018(9):58-62.
- [21] 陈汉文,张笛,曹强,等.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审计思想——实践基础、核心要义与理论创新[J]. 财会月刊,2025(20):3-10.
- [22] 郭鹏飞. 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家审计事业的重大成就、基本经验与未来展望[J]. 当代财经,2023(2):132-143.
- [23] 陈汉文,曹强,张笛,等. 坚持立足经济监督——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审计的定位[J]. 财会月刊,2025(16):3-10.
- [24] 秦中亮. 唐代“巡察六条”内容考辨[J]. 中华文史论丛,2024(2):67-78+412.
- [25] 王永海. 论加强党对审计工作的领导[J]. 审计研究,2024(1):11-17.
- [26] 张晓峰. 新时代新征程国家审计发展的路径[J]. 审计研究,2024(2):3-8.
- [27] 郑石桥,刘星锐. 研究型审计:内涵、类型及运用条件[J]. 南京审计大学学报,2022(1):18-25.
- [28] 戚振东,张紫璇. 研究型审计:一个理论分析框架[J]. 会计之友,2022(6):118-124.
- [29] 陈汉文,曹强,贺东航,等. 坚持开展研究型审计——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审计的方法论[J]. 财会月刊,2025(1):3-8.
- [30] 郭檬楠,田雨薇,焦然. 国家审计信息化建设与国有企业审计收费——基于金审工程的准自然实验[J]. 审计与经济研究,2023(3):11-21.
- [31] 李璐璐,上官泽明. 国家审计信息化建设与民生性财政支出[J]. 南京审计大学学报,2025(6):21-32.
- [32] 习近平. 习近平生态文明文选(第一卷)[M].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5.
- [33] 黄溶冰,谢晓君. 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与地区环境质量——基于自然资源禀赋视角[J]. 资源科学,2023(6):1091-1106.
- [34] 陈汉文,张笛,曹强,等. 坚持建立健全审计整改长效机制——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审计的“下半篇文章”[J]. 财会月刊,2025(18):3-14.
- [35] 沈玲.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审计整改制度:回顾与思考[J]. 审计与经济研究,2022(4):1-8.
- [36] 王会金. 反腐败视角下政府审计与纪检监察协同治理研究[J]. 审计与经济研究,2015(6):3-10.
- [37] 郝炜,汪自成. 纪检监察监督与审计监督贯通的体系化构建——以结构主义为分析视角[J]. 南京审计大学学报,2025(6):66-77.
- [38] Qian W, Huang H. Does improving government auditing independence promote public environmental concern? Evidence from auditing vertical management reform in China[J]. Polish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Studies,2025,34(6):8201-8211.
- [39] Wang T, Wu W. The impact of government auditing on corporate audit quality: Evidence from central audit committee in China[J/OL]. Asia-Pacific Journal of Accounting & Economics, (2025-10-08). [2026-03-31], <https://www.tandfonline.com/doi/full/10.1080/16081625.2025.2564837>.
- [40] 孙宝厚. 关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审计若干问题的思考[J]. 审计研究,2018(4):3-6.
- [41] 陈汉文,张笛,贺东航,等. 坚持党对审计工作的领导——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审计的根本保证[J]. 财会月刊,2024(23):3-11.
- [42] Funnell W. Keeping secrets? Or what government performance auditors might not need to know[J]. Critical Perspectives on Accounting,2011,22(7):714-721.
- [43] 刘家义. 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的国家审计:制度保障与实践逻辑[J]. 中国社会科学,2015(9):64-83+204-205.
- [44] 郝玉贵,郝铮,赵晨. 国家审计服务“一带一路”战略的理论分析与实现路径[J]. 审计与经济研究,2016(2):23-32.

[责任编辑:刘 茜]

Theoretical Origins, Practical Manifestations and International Value of the Idea of “People-Centered” National Audit

ZHANG Rui¹, TIAN Gaoliang², MA Chen¹, TIAN Zichen³

(1.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Northwest University, Xi'an 710127, China;

2. School of Management, Xi'an Jiaotong University, Xi'an 710049, China;

3. School of Accountancy, Singapore Management University, Singapore 178900, Singapore)

Abstract: “People Centeredness” is the core philosophy of China’s national audit. In the context of constructing China’s independent audit knowledge system, this study explores where “People Centeredness” comes from, how it operates, and what it can provide for reference. The study suggests that its theoretical origins include the ideas of popular sovereignty and public supervision in classical Marxist theory, theoretical evolution of audit’s people-served nature in the process of sinicization of Marxism, and modern transformation of the “people-oriented” thought in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Its practical manifestations include the centralized and unified leadership and overall coordination of the Party (mechanism foundation), research-based audit and informatization construction (technical support), audit focus related to people’s interests (work orientation), and closed-loop audit rectification and collaborative supervision system (collaborative guarantee). Its international value lies in providing an analytical dimension, framework, and perspective for international auditing research that differs from mainstream Western theories, and transformable experiences for other countries’ audit development and global public governance.

Key Words: national audit; people centeredness; China’s independent audit knowledge system; international value; national governance; research-based audit